

媒介化社会 与 少数民族发展研究

林晓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媒介化社会 与 少数民族发展研究

林晓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 / 林晓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203 - 0740 - 6

I. ①媒… II. ①林… III. ①传播媒介—影响—
少数民族—民族发展—调查研究—中国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882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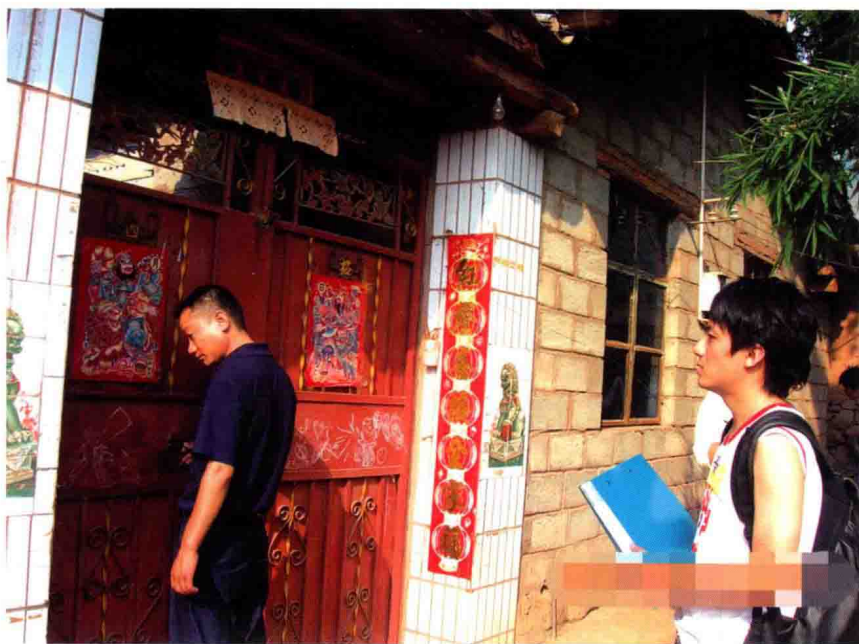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1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项目《藏区政务微信发展策略研究》（编号：2017-GMD-009）成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暨西南民族大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彝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发展研究》成果





敲门



作者在“小凉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凉山乡）走访彝族青年



作者在牟定县江坡乡彝族聚居区访谈



调研组入户访谈

序 言

关注文化民生工程的一部力作

白润生

林晓华撰写的《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从文化民生理念的视角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三农”问题，其学术价值在于调查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信息传播现状，探索少数民族传播的深层模式，提高少数民族农民的媒介素养，提升媒体融合及其传播能力，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发展，探索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这部著作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大花园中又一朵鲜花。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兴起于 20 世纪初叶，至今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了，当前已形成了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新闻传播体系。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出版 103 种，平均期印数 117.52 万份，总印数 21443 万份，总印张 317683 万张，总金额 13724 万元。^① 期刊出版方面，全国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出版 227 种，平均期印数 129.55 万册，总印数 1254.50 万册，总印张 5848.86 万张，总金额 6585.82 万元。^②

2014 年，全国少数民族广播节目播出时间合计 1405.83 万小时，较上年增长 1.91%；全国少数民族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1747.61 万小时，较上年增长 2.46%。2014 年全国少数民族广电总收入 4226.27 亿元。^③ 从中央到地方，包括省（自治区）、地（州盟）、县（旗）共办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彝、傣等 20 余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呈现出满园春色、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① 《2015 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社 2015 年版，第 852 页。

② 同上书，第 861 页。

③ 同上书，第 863 页。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并创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内蒙古新闻研究所。内蒙古新闻研究所当年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省(区)级的专门研究机构,还创办了蒙古文版和汉文版的新闻业务刊物《新闻论坛》。1988年11月上旬,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会(现更名为:中国报协民族地区报业分会)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成立。该会系全国性的新闻学术团体,并创办《民族新闻界》(初名《民族新闻》)作为会刊。这个研究会的影响十分广泛,尤其在新闻业界。

内蒙古乌兰察布日报社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马树勋(回族)主任编辑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民族新闻探索》《民族新闻纵横谈》《民族地区采访经验谈》《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等。其中,《民族新闻探索》获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二等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获得初步发展。199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引起了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6年该书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克信(回族)、蒙应的《民族新闻学导论》,填补了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的一项空白。1998年出版的《内蒙古日报五十年》,论述和总结了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省级党报《内蒙古日报》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办报经验。

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甚至有人称之为“显学”。史学方面有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2000)、周德仓撰写的《西藏新闻传播史》(2005)和《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2010)、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2008)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2008)、帕哈尔丁撰写的《新疆新闻事业史研究》(2009)、张丽萍撰写的《内蒙古民国报刊史研究》(2014)等。实务方面有牛丽红撰写的《新闻报道中的西北民族问题研究》(2007,获甘肃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刘世树等撰写的《走向辉煌——新时期中国民族市州报发展谋略初探》(2011)等。理论研究有张小平撰写的《民族宣传散论》(2005)、邱沛篁等主编的《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报业经济发展研究》(2008)、王晓英撰写的《民族新闻传播简论》(2013)等。周年纪念著作、文集有张小平等主编的《实践

与思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5 周年》(2005)、莫树吉主编的《走向辉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四十五周年巡礼》(2004)、白润生撰写的《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2004)和《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白凯文少数民族文化文选》(2014, 获“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第二届组委会特别奖)、周德仓等主持的《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2013 年结项)等。传播学著作有张宇丹主编的《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2000)、益西拉姆撰写的《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2002)、郭建斌撰写的《鄂伦春族:黑龙江黑河市新生村调查》(2004)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及《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2015)、阿斯买·尼亚孜撰写的《新闻传播与少数民族受众》(2006)、赵丽芳撰写的《存异求同——多元文化主义与原住民媒体》(2008)、徐晓红撰写的《民族地区媒介素养引论》(2010)、庄晓东等撰写的《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2010)、孙信茹撰写的《广告与民族文化产业》(2011)、高卫华主编的《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1)、岳广鹏撰写的《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2012)、李克撰写的《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2013)、朱杰撰写的《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2013, 获甘肃省第十四次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张硕勋撰写的《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2015)、中南民族大学大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编《民族文化传播研究》(2015)。工具书有徐丽华编著的《藏学汇志》(2003)、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生平检索》(2007)、周德仓整理的《〈申报〉涉藏文献索引(1872—1949)》(2015)等。调查报告有《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2010, 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王斌等撰写的《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西藏、新疆地区为例》(2012)、郑保卫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2012)、张志等主编的《人·媒介·社会互动与发展》(2012)等。以上仅是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列举的八类四十部研究成果, 难免挂一漏万。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基本由三大块构成, 即史学研究、对现实

的观照、理论的沉淀与提升。我完全赞成本书作者林晓华的见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首先是历史的沉淀,其次是对现实的观照,最后过渡到理论的抽象,这是一般研究的规律”。从以上八类四十部研究成果来看,诚如林晓华所言,“建立完善的研究机制和研究格局,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这一块,目前还是这个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2012年我为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写的序里说,“我们越是肯定史学成果的丰富与创新,越发觉得少数民族新闻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简论》的问世,变一条腿走路为两条腿走路,‘史’‘论’并进,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找到了新的支撑点。”王晓英《民族新闻传播简论》的出版,虽然对“薄弱环节”有所缓解,但并未彻底改变林晓华所指出的弱项。

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之后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已有长足发展,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还创办了自己的学术组织。2011年7月19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并于2012年12月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是中国新闻史学会所属全国性的二级分支机构,也是全国第一个由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术团体。业务范围是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书刊编辑、咨询服务,接受教育部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赵丽芳副教授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主动与研究委员会合作,成为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之一。2016年5月28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召开,在第二任会长白贵教授主持下,常务委员会就研究委员会章程、入会条件的修改,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单位及相关人员的增补和调整方案,下一阶段学会工作及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一致决定将开办研究委员会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研究委员会将继续健全运行机制,丰富活动内容,加强与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联系、沟通与配合,扩大成员队伍,提升协调能力和管理水平,团结更多的各族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尽快把研究委员会的各项事业和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本书的出版,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走向繁荣的最新成果之一。林晓华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学与研究,2012年他撰写的少

数民族调研报告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首肯，这次在调研的基础上撰写的《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是在其利用本校学生遍布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先后组织团队开展五次媒介调研的基础上，获取的少数民族农村“媒化”现状与少数民族发展的一大收获。该书的学术价值、作者的功力集中体现在第四章“对策思考：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的传播能力”和第五章“深层模式：民族传播中‘媒化’机制研究”之中。

第四章主要总结和论述作者 2006—2015 年近十年五次深入民族地区，围绕同一主题“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发展”调研的结果，结论是：民族地区自然灾害与重大突发事件频发度呈上升趋势，大众传播面临新的压力与考验；传统主流媒体（电视、报纸）依然有重大影响力，而传播不及时、不全面的短板也十分明显。尤其是有突发事件袭来，网络、手机则成为少数民族高信任度、高使用度的媒体。由于微博、论坛、贴吧等新媒体没有严格的把关人，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控制舆情”，发挥“提振”作用，改变新媒体在民族地区的失衡状态，作者据实提出切合实际的举措。首先改变传统主流媒体的播报方式；政府重点发展民族地区传媒“双语合璧”机制，使之尽量跨越“有声有影有字”初级阶段，做到传播的“入脑入耳入心”。在这一章还设有两节即第二节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对策探究和第三节少数民族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策略，对于如何提升民族地区舆论引导能力进行了探索。

在第五章，作者就羌族、哈尼族、藏族信息传播中“媒化”机制的深层模式进行了专门研究。羌，亦称羌戎。古族名。商周时，已广泛分布在今青海、甘肃、新疆南部和四川西部一带，有一部分羌人曾迁入中原定居。羌族，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自称“尔玛”或“尔咩”。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以及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等县。现存的石棺葬，属羌人中戈基人的墓葬，为西汉文物。1936 年 4 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羌族地区时，成立茂县工农民族政府。新中国成立前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羌族是一个只有民族语言，没有文字的古老民族。大多信奉原始宗教，最敬白石神。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南岸，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澜沧江拉祜族自治县为多，云南北部和中部地区亦有分布。操哈尼语。1957 年创制

哈尼文,属拼音文字类型。藏族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使用藏文藏语。多信奉喇嘛教,文化遗产丰富。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710年,赞普墀德祖赞又与唐金城公主联姻,双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佳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在阿坝、甘孜等地建立过革命政权。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地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1959年平息了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度,径直跨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媒化”机制是当今网络时代,经过大众传媒展演之后,在少数民族传播中形成的“深层模式”。作者认为,自古以来形成羌笛“悲凉”的“刻板印象”的原因是羌族文化传播中缺乏“主体性”。由于传媒设置议程的变更,关于天仙妹妹的传媒报道摒弃了庸俗的网络炒作话题,围绕羌族文化的挖掘、保存和发扬的主题,把人们的目光引导到对羌族儿童,尤其是女童的关怀上。汶川地震后,天仙妹妹以自己的网络身份换得无数“粉丝”对灾区的关注和支援。2008年,尔玛依娜(天仙妹妹)入选奥运火炬手,成为羌族文化的代言人。由被动而主动的议程设置的转变,实现了对羌族文化的理性传播。在作者看来,具备了“自然主体”和“文化主体”本民族认可的人物才可实现羌族文化的正确、全面传播。2008年汶川大地震,羌族文化遭到近于毁灭性的打击。全国各大媒体就保护和传承羌族(羌笛、羌女、羌绣、羌碉、羌语、释比)文化进行持续报道和紧急呼吁。震后八年,羌族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羌族文化美丽重生。作者认为,羌族的整体文化自觉,是加强羌族文化传播主体性的根本。羌族文化的完整保护、延续与开发,首先是羌族人民的自觉,所有羌族人民都应有保护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

在探讨哈尼族“媒化”机制深层模式时,作者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屏障”的理念。他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屏障,指借助宗教信仰这种在族群群体中具有高认同度的强势文化,在群体与个体心理上树立具有内生性的规范机制、约束机制,从而在群体成员中形成对于族群文化传承、生态建设理念的高度认同。由此,借助宗教艺术力量,使得民众自发保护自然,并把对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不断纯净,作为族群所有成员的集体意识。”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诚如作者所阐述的那样,“哈尼族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智慧,则可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另一重要来源:民族资源”。人类总是不断甚至无限

地向自然索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原因是“不加约束、不加规范的主体性”。如何规范、约束主体性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即人类的生产活动、各种社会活动不要危及生态平衡。政府、法律的力量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培养内在的调节机制。作者认为，哈尼族宗教艺术中生态文化屏障概念对于建立个体心理的内在规范机制，将生态保护内化为全民的心理意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哈尼族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仅仅依靠宗教文化力量保护本民族的生态文明建设，显然是处于“守势”，而借助民族文化屏障，对本民族生态建设将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调研表明，西藏自治区正在加速进入网络社会。互联网在西藏的普及，缩短了西藏外界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沟通交流方式。媒介化引起了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

1. 媒介化对藏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影响重大，给藏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本次调查在拉萨藏历新年期间进行，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新媒体在调查样本中已实现全覆盖，并为藏族传统节日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比如，拉萨藏历新年期间藏族同胞喜欢发微信红包，发微信联系亲友，送上节日的祝福；节日期间，人们通过手机、互联网观看全球各地的电视剧、电影，收听流行音乐，不少人渐渐不爱观看传统的藏族歌舞表演。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一看就懂，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

2. 网络社会给这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带来的变化是深远的。部分人空闲时间不再去寺庙拜佛、转经、祈祷，而是去游玩。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认为宗教活动比较沉闷，游玩更有趣；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种类繁多，有趣味；通过新媒体了解世界各地节日的庆祝方式，也想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节日中去。供“切玛”，尝“切玛”，到亲戚家拜年送“切玛”，这个长期形成的习俗，近几年正在逐渐消失，尤其是在城市已经少见了。过年^①不少人家喜欢贴藏文春联，走亲访友不再带“切玛”，而是送礼盒。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部分藏族同胞在重大节日不再穿藏装，喜欢穿衬衫、裤子、裙子。因此，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藏装也在进行改革，融入了其

^① 藏族的“年”，因时间与习俗不同有三个：拉萨等地以藏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称为“帝王年”；曲水、日喀则、江孜等地以藏历十二月初一为新年，称为“农民年”；工布、米林、林芝等地则以藏历十月初一为新年，称为“工布年”。

他民族的服装特点。总之，媒介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从传统节日习俗到新潮节日的庆祝方式，从心理到行动，从单一民族文化到多种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当前，学界提出的“文化援藏”观点，成为藏族传播中“媒化”机制中“治边稳藏”的重要途径。

调查证明，“新媒体已成为藏族传统节日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为藏族民间传承与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新媒体的出现使藏族社会媒介化进程加快，极大地增强了媒介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

羌族、哈尼族、藏族等民族传播中的“媒化”机制研究，虽是个案特色研究，但代表性强，论证具有说服力，成为“少数民族社会在‘媒化’进程中，正在逐步建构出一种新的族群性”这一结论的有力支撑。作者这种水到渠成的内在的逻辑力量，令人心悦诚服。

通读全书，作者潜心研讨的“大规模的‘媒介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民的媒介素养问题；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对少数民族农民的影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深层模式探究；媒介化与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等等，无不关注少数民族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并以少数民族同胞熟悉的、喜爱的书写形式和价值取向彰显论题的个性与品质。显然，《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是一部字里行间洋溢着关乎亿万少数民族同胞的“家”“国”情怀的“文化民生”工程力作。

是为序。

自序

十年光影

2016年5月22日，四川大学新闻学硕士生答辩，我列席答辩委员，遇到博士同门冯、杨、陈三位师兄。冯师兄谈起：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博士论文答辩十周年纪念日。大家感慨良多，不胜唏嘘。

5月22日对于我来说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写作一年多，书稿《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一书在今天结稿了。写自序时，心中有一点点如释重负，更多的是对这十年时光的回首。

十年风景，光影变幻。2003年我进入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导师邱沛篁教授就曾提点我要多关注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研究少数民族传播现象。2004年博士论文选题，在邱老师指导下，我确定了《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作为学位论文论题，并带领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第一次媒介调查。2006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利用本校学生遍布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我又先后组织团队开展了数次媒介调研，这几次调研的方向为：民族地区农村“媒化”现状与少数民族发展。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学科。近年来，这个领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以20年的功力凝聚成《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该书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与研究、队伍建设）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全面系统地挖掘和阐发了其中所蕴涵的新闻传播规律。书中指出：中国历史新闻传播学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没有55个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的新闻传播就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科学的、系统而全面的史学著作。此类优秀著作还有西藏民族大学周德仓教授的《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藏文报

刊史的一个重大空缺。此外,云南大学郭建斌教授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在传播民族志和媒介人类学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实际上,近年来这个领域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以上三部著作仅是近年出版的民族传播学术成果中的佼佼者。

以我之浅见,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构成有三大块:一是史学研究;二是对现实的观照;三是理论的沉淀。前面所述的三部专著正是史学研究与现实观照的优秀代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首要的事情是历史的积淀。其次,这个学科的重要意义在于:直面现实,特别是直面现实的困难和挑战。

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面临的是大众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具体问题,在社会大规模的“媒介化”进程中,传播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日常化、生活化的一部分,是如何在本地的社区网络中嵌入、运行并发挥影响的?

因此,在将“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发展”作为论题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触角已延伸到了乡村的角角落落;那么,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农民生活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有多大的影响?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农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十年来的五次少数民族地区调研数据,我努力对民族传播的深层模式进行综合、概括、提炼,并进而探索:在媒介化进程与少数民族族群性的互动中,少数民族是否会演化出一种新的族群性?

以上思考,可以说是我致力于民族传播研究十年光影的一个句号。虽然思考暂告一个段落,书稿已经成形,但是我深知它的肤浅,也可能随处是缺陷。但是,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一次新的起点。如前所述,当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历史的积淀、对现实的观照这两方面已有大成;但是,在建立完善的研究机制和研究格局,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这一块,目前还是这个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

探索既然开始,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与信息传播现状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媒介化进程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这个有着极强现实意义,同时又充满挑战的命题,相信会有更多的实践者、研究者去不断推动、深化它。

林晓华

2016年5月22日于西南民族大学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对象	(1)
二 文献综述	(4)
三 研究方法	(9)
第一章 “媒介化社会”理论	(12)
第一节 “媒介化社会”的历史发展	(12)
第二节 “媒介化社会”理论的内涵	(20)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发展概况	(25)
第二章 主体自觉:少数民族农民的媒介素养现状调查	(30)
第一节 少数民族媒介素养的内涵	(31)
第二节 “少数民族农民的媒介素养”调查活动的开展	(42)
第三节 “少数民族农民的媒介素养”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 与分析	(44)
第四节 构建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基本途径和 方法	(62)
第三章 “媒化”现状:少数民族地区“媒化”进程的实证研究	(81)
第一节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农民的影响度	(81)
第二节 传统主流媒体在民族地区的公信力状况	(90)
第三节 手机媒体在民族地区农村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98)
第四节 主流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接受现状	(106)